

行走中国丛书
主编◎张昌山 耿昇

A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PEKIN (1719—1722)



从圣彼得堡到北京 旅行记 (1719—1722)

(英) 约翰·贝尔◎著
蒋雯燕 崔焕伟◎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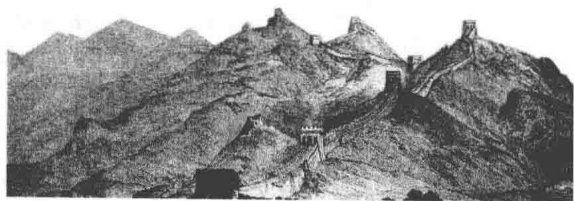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行走中国丛书
主编◎张昌山 耿昇

从圣彼得堡到北京 旅行记（1719—1722）

（英）约翰·贝尔◎著
蒋雯燕 崔焕伟◎译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圣彼得堡到北京旅行记: 1719—1722 / (英) 约翰·贝尔著; 蒋雯燕, 崔焕伟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8. 11

(行走中国丛书 / 张昌山, 耿昇主编)

ISBN 978 - 7 - 222 - 17893 - 9

I. ①从… II. ①约… ②蒋… ③崔… III. ①游记 - 作品集 - 英国 - 近代 IV. ①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7884 号

出品人
赵石定

责任编辑 王 韬 郑燕燕
责任校对 周 彦
装帧设计 张力山
责任印制 窦雪松

从圣彼得堡到北京旅行记(1719—1722)

〔英〕约翰·贝尔 著 蒋雯燕 崔焕伟 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出版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17893 - 9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0871 - 64164626 出版部电话:0871 - 64191534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T R A V E L S
 FROM
 ST. P E T E R S B U R G
 IN
 R U S S I A,
 TO
 D I V E R S E P A R T S
 OF
 A S I A.
 IN
 T W O V O L U M E S.
 BY
 J O H N B E L L,
 OF A N T E R M O N Y.
 V O L U M E I.

C O N T A I N I N G

A journey to ISPAHAN in PERSIA,
 in the years 1715, 1716, 1717, and
 1718.

Part of a journey to PEKIN in CHI-

NA, through SIBERIA, in the years
 1719, 1720, and 1721. With a map
 of the Author's two routes between
 MOSCO and PEKIN.

G L A S G O W:

PRINTED FOR THE AUTHOR BY ROBERT AND ANDREW FOULIS
 PRINTERS TO THE UNIVERSITY
 M.DCC.LXIII.

Sold by R. & A FOULIS, and A. STALKER at GLASGOW; KINCAID & BELL
 at EDINBURGH; A. MILLER, J. NOURSE, T. BECKET & P. A de HONDT,
 and C. HENDERSON in LONDON; J. LEAKE, and J. FREDERICK at BATH;
 and T. CADELL at BRISTOL.

总 序

张昌山

从黑格尔以来，传统中国长期被欧洲中心主义者视为一个“停滞的帝国”。这一观念出现几十年之后，国人终于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李氏又在《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对世界和中国的这种认识还在多个场合说过。当时的中国，一下子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迅速跌进五大洋、四大洲之中的世界，甚至只是亚洲东部一个落后的大国。

这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就是以工业革命为主导的近代化及现代化，而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这一近代化及现代化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百年间，一些中外人士行走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在变动的土地上。行走中，既有外国的传教士、外交官、探险家，更有中国的文人、学者、科学家、商人、军人，甚至有家庭妇女。他们的游记、札记、考察报告、探险实录等，见证并记录了其自身行走的经历和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的过程。当时写下这些文字的人虽身份各异，目的不同，但每一部作品记录的都是作者个人的观察与体验，也记载了他们的所思所想和个性特征。而不同的作品拼合起来，则在横向空间上似画卷一般展现了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面貌，而在纵向的时间上则有如电影

一样显示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变迁的细节与大势。在他们笔下，中国不再是故纸堆中的陈旧记忆，而是活生生展开的现实景象。

把历史还原到现场和实际生活，这大概是每一个想了解历史的人的最大愿望。我们从这些作者在中国的行走、体验之中看到了一种活态的中国历史，它们明显区别于以往的正史和官方档案之类的文献资料所记录的静态中国历史，而且，人生的丰富性、视角的差异性及社会的多元性，也尽在其中了。

德国学者赫尔德所倡导的“同情之理解”，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在中国学者中以陈寅恪等用得最深也最好。如今，我们把这些中外作者的各类作品作为历史文本来阅读、感受和研究，通过这些文本去体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行走、见闻与思考，这也是一种“同情之理解”的实践。今天的人们可以从中感受这些作者所体验的中国社会，从而更具体更深刻地观察了解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进程的艰辛与经验。

将中国放在整个世界大格局中来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大致就是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走向世界和走向现代的过程。鉴往才能识今和知来，但由于过去的观念、方法、习惯和经验等因素，有意无意地遮蔽和塑造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与解释，因此，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套“行走中国”大型丛书，是在回头观看百年中国之动静，是在体会“我看人看我”的经验，其实质则是向前进，走向永恒的未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洪流和时代的浪潮虽然可能会被拖延，却不可能永远被遮挡。司马相如曾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李鸿章有言：“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这两句话的时间相差两千年，表达的却是同一种心声，谨抄录于此，作为我们对国家和时代的期许。

是为序。

2015年5月



译者的话

1719—1722年俄国彼得一世派遣列夫·瓦西里耶维奇·伊兹玛伊洛夫 (Leoff Vassilovich Ismayloff) 使团^①来华是中俄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随团医生、自然科学家——英国人约翰·贝尔 (John Bell, 1691—1780) 根据其赴华经历写成了《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中国北京旅行记》(*A Journey from St. Peterburg in Russia to Pekin in China*)。这是第一部由亲历北京的英国人写的中国旅行记。1774年, 首位到西藏的英国人博格尔 (George Bogle) 指出: “五十余年前一位非常年轻的英国大夫曾随俄国使团去北京觐见中国皇帝, 除此之外我从未听说有第二人到过北京。”^②英国学者马歇尔 (P. J. Marshall) 曾指出: “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并非是来到北京并且描写过它的第一批英国公民。这个荣誉应归功于一个叫约翰·贝尔的苏格兰人……”^③虽然, 其苏格兰同胞格文 (Thomas Gaven) 医生曾早贝尔5年应俄国之邀来到中国朝廷为康熙皇帝服务, 但未曾留下过任何有关中国的记录, 约翰·贝尔被认为是“来过北京并出版了一部有关中国的旅行记的第一位英国人”。^④

首先来介绍一下伊兹玛伊洛夫使团来华的缘起与历史背景。自1618年起, 俄国政府便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派出使臣、官方使团和商队, 以1689年《尼布楚条约》起到1727年《恰克图条约》间尤甚, 商业利益始终是主导俄国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最终目的。新航路的开辟,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已经对东方的中国市场跃跃欲试, 当时的俄国也正在忙于欧洲战场的对抗和对内的政府机构改革, 国库紧缺。因此, 利用地理优势抢先开辟中国商路, 利用贸易的利润来充实国库成为彼得一世时期主要的对华政策。《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 清政府对频繁来华贸易的俄商不满, “为俄商提供粮秣、车马不胜其烦”。^⑤对于毛皮这类俄国商品, 中国市场也货物充裕。而中俄买卖引发的债务纠纷也频繁发生, 扰乱社会治安, “况俄国人来此者, 既不守任何规章, 也不遵从我国惯例, 又多次恣意妄行, 挑起口角与争端”。^⑥于是, 中国政府开始限制俄国贸易, 1717年康熙谕令: “今后不得再派俄商来北京, 待过几年后方可派商人至敝国边境地区经商。而且由于北京愿买俄国货物的买主甚少, 今后人数不多之俄方来



商，为便于相互贸易，应在边境城市出售其货物，且需有该省长所发之护照。”^⑦

此时彼得一世政府正忙于同瑞典的北方战争，只好采取温和的态度与清廷协商。1719年3月30日，彼得一世派伊兹玛伊洛夫为特使携团出使中国以恢复俄中贸易。给伊兹玛伊洛夫的训令规定，此次使团来华主要目的是希望恢复俄中贸易，解决边界遗留问题，比如希望准许自由通商，常设在华商务代表，解释俄国在西伯利亚所属亚梅什湖和斋桑湖建立若干城堡一事等，此外还要打探中国关于物产、地理和军事方面的情报，交涉礼仪问题，并请求在北京修建一座东正教教堂。^⑧除了彼得一世的训令外，商务委员会也为使臣制订了内容具体的训令，除了竭力说服中国边境官员允许俄国商队前往北京，还要求允许使团秘书劳伦茨·郎克（Laurence de Lange）作为商务代表留驻北京。

据贝尔记载，使团随行人员除了使臣伊兹玛伊洛夫外，还有一秘劳伦茨·郎克、二秘伊凡·格拉祖诺夫（Ivan Glazunoff）、近卫军下级军官扎谢金亲王（Kneaz Alexander Saseckin）、商务部代表尼古拉斯·保利·克利斯蒂奇（Nicolaus de Pauli krestitz）、普雷奥布拉任斯基联队的军士吕基昂·尼斯特洛夫（Lukian Nesteroff）和阿历克西·迪沃夫（Alexie Divoff）、大卫·格拉夫（David Grave）、神父格里高里（Gregory）以及翻译、差役、乐队、雇员等60名左右工作人员和25名龙骑兵。^⑨

1719年7月14日使团从圣彼得堡出发，经过莫斯科、喀山、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色楞格斯克，伊尔库茨克，于1720年9月22日进入中国领土，经尼布楚穿越蒙古沙漠从长城入关，11月5日到达张家口，11月18日进北京，三个半月后于1721年3月2日离开北京。3月12日出长城，近10个月后于1722年1月5日回到俄国莫斯科，往返历时两年半。这是俄国使团首次开创取道蒙古到北京的新路线。

伊兹玛伊洛夫使团并没有按照俄国的预期完成其外交使命。该使团在华期间，发生了700多名蒙古属民逃往俄国的事件。清政府要求伊兹玛伊洛夫派人与中国官员一同前往边境会见西伯利亚省长，要求其交出逃人。1720年12月18日至1721年3月2日，使臣与中国政府官员进行了会谈。当使臣提出俄方的要求后，中方认为贸易乃无关紧要的小事，对两国均无利益可言，只有中国逃人被找到，才能缔结有关自由贸易的条约。如果商队感到由俄国色楞格斯克到北京的路途遥远，还可以寻找一条经珲台吉领地的路线来克服这一困难，中方还将在边境建立一座城市来进行贸易。^⑩清廷官员还抗议说，《尼布楚条约》缔结后，俄国人仍然在边界安加拉流域建立了阿穆坎、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等城市，有时还继



续向中国边境推进，他们还在中属额尔齐斯河一带的盐湖附近建立要塞。^⑪伊兹玛伊洛夫在京期间，蒙古逃人问题终未解决，因此俄方要求也未得到满足。于是使臣留下郎克作为商务代表，驻京继续与中国政府商议两国间的贸易问题和边境遗留问题。1721年4月8日，使团返回色楞格斯克，这里清政府官员要求使臣解决蒙古逃人问题，伊兹玛伊洛夫却以没有沙皇谕旨敷衍了事。等使臣回国后，俄国政府始终未就逃人问题给中方答复，却传来彼得一世接待噶尔丹使节的消息。准噶尔问题一直是清政府的心腹大患，俄准联合是清廷最为忧虑的事。因此清廷很气愤，与俄国断绝了一切信函往来和贸易关系，驱逐库伦俄商，限期令商务代表郎克离京，并拒绝在边境等候的俄国商队和库利茨基主教入境。

本书作者、随团医生约翰·贝尔，1691年出生于苏格兰安特蒙尼，1714年7月去俄国，在圣彼得堡学习外交，经彼得一世的内科医生兼私人顾问阿列斯金（Areskine）医生举荐，1715—1718年曾以随团医生的身份跟随俄国沃伦斯基使团出使波斯。1718年回到圣彼得堡后，经波斯使团使臣沃伦斯基的举荐，他成为俄国派往中国的伊兹玛伊洛夫使团的随团医生，在1719—1722年间出使中国。1722年他参加了俄国向杰尔宾特的远征。1734年短暂返回苏格兰后再次回到俄国，1737年后在君士坦丁堡挂牌私人行医。1746年他回到故乡苏格兰的安特蒙尼永久定居。^⑫

约翰·贝尔将自己从1714年到俄国至1746年回故乡期间32年的旅行经历分别写成了四本旅行记：《从俄国的圣彼得堡到波斯的伊斯坦布尔旅行记》《从俄国的圣彼得堡到中国北京旅行记》《杰尔宾特旅行记》和《君士坦丁堡旅行记》。1763年，贝尔将他的四本旅行记连同他翻译的《郎克日记》一起结集出版，这就是出版于格拉斯哥的《从俄国的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区旅行记》（*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2 vols., Glasgow, 1763）^⑬。该书共两卷，上卷包括《从俄国圣彼得堡到波斯伊斯坦布尔旅行记》和《从俄国的圣彼得堡到中国北京旅行记》的一至八章，其九至十四章与《郎克日记》《杰尔宾特旅行记》及《君士坦丁堡旅行记》被收录在下卷中。1788年该书在爱丁堡再版^⑭，1806年重版，此次出版包括法语、俄语等多个译本。1811年该书被收入1808—1814年伦敦书商约翰·诺克斯（John Knox, 1720—1790）出版公司的《航海旅行总集》（*A general collection of voyage, discoveries and travels*, 7 vols., 1767）之卷7出版。《从圣彼得堡到北京旅行记》^⑮是《从俄国的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的旅行记》中的第二部分，篇幅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1966年爱丁堡版斯蒂芬森（Stephenson）将它单独整理成《公元1719—1722年从俄国圣彼得堡到北



京的旅行记》^⑩一书，在爱丁堡出版。1966年纽约巴恩和诺贝尔（Barnes and Noble）出版了由斯蒂芬森整理本，改名为《从圣彼得堡到北京之行》。

本书以1719—1722年俄国伊兹玛伊洛夫使团来华为主线，根据1763年格拉斯哥版的《从俄国的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区旅行记》（*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1763）为原著，将该书中约翰·贝尔的《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到中国北京旅行记》附上郎克的《郎克日记》一并翻译并出版。本书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除了尘封在莫斯科档案馆的《伊兹玛伊洛夫使团团长公务日志》外，它是俄国彼得一世时期伊兹玛伊洛夫赴华使团成员唯一的亲历笔录。它又是18世纪早期的中国游记，对于汉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和跨文化研究者而言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还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语言简洁，内容丰富的有趣的文学读物。

贝尔的旅行记分为十四章，记录了使团从俄国圣彼得堡出发到中国北京的沿途见闻。内容如下：一至七章记载了从圣彼得堡到中国长城脚下的沿途见闻。进入中国以前，贝尔对俄国从莫斯科到喀山、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色楞格斯克、那里穆柏兴（尼布楚）至中国长城脚下沿途的山川、河流、动物、植物、民间传说、物产以及民风民俗都有详细的记载，贝尔以自然科学家的目光记录了西伯利亚美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物产与动植物和交错杂居的民族，还特别记录了沿途蒙古各部族、卡尔梅克人的情况，收集了关于土谢图汗的相关信息。第八章记载了从长城入关到抵达北京城沿途的寺庙、城市、建筑物以及人民生活。书中如实记录了入关后多次沿途官员的接待与宴请，表现出作者对中国人热情而重视礼节的钦佩。在九至十一章连续三章的“北京见闻”中，记载了使团驻京期间，贝尔正面接触和感受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时所了解的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对皇帝的数次接见，在皇帝的行宫中过元宵节，各级大臣到使团驻地的拜访，与在华耶稣会士如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戴进贤（Ignace Keaggler, 1680—1746）、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费隐（Xavier - Ehrenbert Fridelli, 1673—1743）、喜大教（Nicolas Giamprimo, 1686—1759）等传教士的交往，皇帝的赐宴，去各国驻京的教堂参观等均都有记载。如果说八至十一章是作者根据使团在北京的日程安排和活动对中国北京的见证实录，那么第十二章“中国现状”则是作者根据收集到的信息、结合所见所闻对中国的整体描述。该章介绍了中国的音乐、舞蹈、戏剧、杂技等艺术和焰火、斗鹤鹑、打猎等各种民俗活动；描述了中国传统礼仪和各种生活习俗、建筑街道城墙及其听说的其他城市建设；赞誉了康熙皇帝；分析了人民的性



格、从西方人的角度较客观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瓷器、丝绸、冶金、陶器、印染、漆器等）和古代中国四大发明；简要介绍了中国历史和传说，并抒发了自己对孔子、长城、中国妇女、军事、宗教和医药等等方面的看法。此外还提到在中国北方刚刚发生的地震，谈到了弃婴、妇女裹小脚等社会现象，并附上了部分中国的汉字对应的读法。第十三至十四章则记录了离开北京经苏古特返回莫斯科的沿途见闻。全书语言简洁，曾经被《每季评论》（*Quarterly Review*）称为“英文游记写作的典范”。^⑦

《郎克日记》的作者劳伦茨·郎克是德国人，1715—1737年间先后6次来华，第一次来华在1715—1716年间，主要为彼得一世采办货物，带英国医生托马斯·格文来华为康熙皇帝服务。第二次是跟随贝尔所在的伊兹玛伊洛夫使团1719—1722年间赴华谈判。第三次来华是1726年随萨瓦使团前来参加《恰克图条约》的谈判。第四次来华是1727年率俄国政府商队来华贸易。第五次是1732年率俄国商队来华贸易。他首次将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出版物带到中国，在北京参加了地震中毁坏的北京东正教堂的重建工作，回国后任西伯利亚总督。1736—1737年间是他第六次来华，职务依然是商队领队。他写作并出版的综述性著作《中华帝国描述》用14章的篇幅介绍了大量有关18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情况，该书是研究早期中俄关系以及中俄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素材。约翰·贝尔翻译的《郎克日记》记录了郎克第2次来华即1719—1722年以秘书身份随伊兹玛伊洛夫使团的经历。他在伊兹玛伊洛夫离京后以俄国商务代办的身份继续留京，与清政府交涉通商事宜。该日记不仅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记录了18世纪初期俄国与中国就边界和商贸问题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对话和斗争，而且记录了此行使臣觐见中国皇帝时与大臣们的谈话，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外交官眼里中国的政治世界。约翰·贝尔将其从德文译成英文，作为有益补充试图更加完整地展现伊兹玛伊洛夫使团此行的各方面情况。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约翰·贝尔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中国北京旅行记》是由蒋雯燕翻译，劳伦茨·郎克的《郎克日记》是由崔焕伟翻译、刘竞进校对。翻译此书的初衷得回溯到2008年，当时两位译者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研，恩师柳若梅教授推荐了这部游记。在她的指导下，蒋雯燕的硕士论文是用形象学的理论研究约翰·贝尔笔下的中国形象，崔焕伟研究图理琛的《异域录》。毕业后，两位译者开始着手翻译。数年间，对译者而言，工作、生活和学业同时扑面而来，于是翻译工作就断断续续，甚至中途有几年一度停顿，等初稿完成后，两位译者一晃已过而立之年。后面开始新一轮的校对工作时，硕士毕业于北京外国



语大学的刘竞进加入进来负责校对《郎克日记》的译稿。当交出拙作之时已是2016年，感叹流金岁月里，它见证了我们的成长，见证了十年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一段难忘的师生情、同窗谊。

书中不免仍有很多错漏和不足之处，还有待各位读者批评指正。在此书即将付梓之时，特此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柳若梅教授、顾钧教授和张西平教授，师恩重如山，无论专业、学业还是事业，我们的每一点进步都来自老师们言传身教。特此感谢蒋雯燕和刘竞进的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外语系，作为坚强后盾，它给了我们工作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支持。感谢译者的家人们，用无私的爱托起我们飞翔的翅膀。

蒋雯燕于江城武汉

注释：

①Leoff Vassilovich Ismayloff 中文译名是根据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6页。

②Clement and Markham, *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 New Delhi: New Delhianjusri Publishing House, 1971, p167 - 168.

③P. J. Marshall and Glyndwr Williams, *The Great Map of Mankind: British Perceptions of the world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83.

④叶向阳，《17、18世纪英国旅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102页。

⑤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关系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4页。

⑥同上，第102页。

⑦同上，第102页。

⑧同上，第107页。

⑨据《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第153页记载，该使团成员还有科学院的两个测量员西奥多尔·巴尔涅夫和米契尔·伊哥纳季耶，两个贵族尼古拉·巴甫洛夫和巴西尔·格鲁舍兹科伊，一个私人秘书，一个译员伊凡·克雷梅涅夫斯基，伊尔库茨克修道院院长安东尼·布拉阔夫斯基。据《俄国来华使团研究（1618—1807）》第60页记载，一共3名军士，除了贝尔提到的两名外，还有一



名军士雅科夫·祖巴列夫。

⑩叶柏川,《俄国来华使团研究(1618—18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⑪《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17—118页。

⑫加斯东·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60页。

⑬1763年格拉斯哥(Glasgow)出版发行该书(两卷本),1788年由爱丁堡W. Creech再版。

⑭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2 Volumes. Edinburgh: Printed for William. Creech, 1788.

⑮书名是:“A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Pekin in China, with an embassy from his Imperial Majesty, Peter The First, to Kamhi, Emperor of China, in The Year MDCCXIX”。

⑯J. L. Stevenson edited, “A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Pekin, 1719 - 1722”,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Inc. 1966.

⑰叶向阳,《17、18世纪英国旅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103页。



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中国北京旅行记 (1719—1722)

随彼得一世大帝使团觐见中华帝国康熙皇帝

使团主要成员名单

列夫·瓦西里耶维奇·伊兹玛伊洛夫	特命使臣
劳伦茨·郎克	使团秘书 (一秘)
伊凡·格拉祖诺夫	使臣的秘书 (二秘)
克奈兹·亚历山大·扎谢金	使团主要成员
尼古拉斯·保利·克利斯蒂奇	使团主要成员
吕基昂·尼斯特洛夫	使团主要成员
阿历克西·迪沃夫	使团主要成员
大卫·格拉夫	使团主要成员
约翰·贝尔	使团主要成员
格里高里	牧师

全团翻译、雇员、乐队、男仆、步兵等等，共计约 60 人，此外，还有 25 个龙骑兵组成的卫队护送使团从托博尔斯克到北京并随同返回。



目 录

译者的话 / 1

第一章 从圣彼得堡到西伯利亚的首府托博尔斯克 / 1

第二章 托博尔斯克见闻，关于卡尔梅克人和前往托木斯克的沿途
记录 / 11

第三章 托木斯克见闻，以及关于特祖利姆鞑靼人和前往伊利姆斯克的旅途
见闻 / 20

第四章 雅库茨克、堪宗斯克、伊尔库茨克的旅途见闻 / 29

第五章 从伊尔库茨克穿越贝加尔湖去往色楞格斯科的旅途见闻，关于呼图
克图的传说 / 37

第六章 色楞格斯科的见闻，狩猎，去萨拉特津的途中，中俄两国的边境 / 46

第七章 穿越萨拉特津、进入中国领土直到抵达长城脚下的沿途见闻 / 55

第八章 从中国长城到北京，进入北京城沿途见闻 / 65

第九章 使团驻京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使臣的会见等等 / 73

第十章 使团驻京期间发生的一些事（续）等等 / 83

第十一章 使团驻京期间发生的一些事（续），新年皇宫里的春节等等 / 94

第十二章 关于中国当朝皇帝、中国长城的一些介绍等等 / 104

第十三章 启程离开北京，返回莫斯科途中发生的事情 / 116

第十四章 到达苏尔古特，启程前往莫斯科，对一种叫犴犴的动物的描述
等 / 127

附：郎克驻京笔记（1721—1722） / 134



第一章 从圣彼得堡到西伯利亚的首府托博尔斯克

我刚从伊斯法罕^①（Ispahan）返回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就听到一则坏消息：我尊贵的朋友阿列斯金医生已于半年前与世长辞。得知这个消息后没多久，我就听说俄国即将派遣使团出使中国，他们的彼得陛下已经任命伊兹玛伊洛夫先生为使臣，这位先生是近卫军团的一位大统领，在国内家门显赫，受人尊敬，于是我非常渴望能加入该使团随团出使。

于是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个熟识的好友阿特米·彼洛维奇·瓦伦斯基先生（Artemy Petrovich Valensky），他立即将我举荐给使臣伊兹玛伊洛夫先生。后来使臣先生无论在任何场合都待我十分友善，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贯穿整个旅途，回国之后也一直保持，直到 1736 年先生去世。

从伊斯法罕回到出发去北京前夕，我一直呆在圣彼得堡与一些老熟人和朋友们交往。我尊敬他们，他们当中有些是从我的祖国前来经商，为彼得陛下效力并受人尊敬的人物，还有一些是我曾经去波斯（Persian）的旅途中结识的俄国绅士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身份显赫的人物。

当使臣先生的派遣手续就绪并且赠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准备好后，我于 1719 年 7 月 14 日随同郎克先生、格拉祖诺夫先生及其他一些随行人员从圣彼得堡出发，其中郎克先生是瑞典人，而格拉祖诺夫先生是库兰人^②。为了便于获得驿马，在去莫斯科的途中我们组成几个小分队。炎热的天气迫使我们不得不趁早晨和晚上赶路，而且还不得不走一小截路就停下来歇一歇。这条路上的独特景观我已在去波斯的途中描述过，在此就不再重复了。

我们于 7 月 30 日抵达莫斯科与使臣先生会合，途中一切顺利，他在途中超越了我们，结果比我们早两天到。我们住在凯旋门旁贝雷沃夫先生（Belayof）的房子里。我们在这儿呆了五个星期，备好去喀山（Cazan）走水路所需的船只和走这段人烟稀少的长路所需的必备物资。在这里，我们受到当地人的邀请参加了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9 月 9 日，我们把行李运上船。在确保出发前一切准备就绪后，全体人员登



上船，鸣枪九响，然后我们开船出发，船只沿着莫斯科河顺流而下。按说从莫斯科航经雅罗斯拉夫（Yaroslave）去西伯利亚会近一些，但是沉重的行李阻碍着我们的进程，行李主要是彼得陛下赠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因此，我们尽可能走水路。

后来，我们沿着莫斯科河顺流而下，经过克鲁姆那河（Kolumna）之后，进入奥卡河（Ocka），沿途经过了佩列斯拉夫－利散斯科（Pereslave－Resansky）、穆鲁姆（Murum）和其他一些不知名的村镇，我们抵达了尼什那－诺沃哥罗德（Nishna－Novogorod），它是奥卡河与伏尔加河（Volga）交汇处，位于奥卡河岸的一块高地上，在我们的右手边。当船驶离尼什那后，我们进入伏尔加河朝喀山行进。

经过六周的航行后，我们于10月20日抵达喀山。我们原本打算沿伏尔加河继续向卡马河（Kama）前进，然后再逆流而上前往索利卡姆斯克（Solikamsky），卡马河是在距喀山60俄里处与伏尔加河交汇的。但是由于季节与气候的原因，大雾提前降临了，我们被迫停留在喀山等候冬季的到来，这样至少我们可以避免被封锁在冰冻的卡马河无人区。

做出这个决定后，我们卸下帆船在这个城市先住了下来。在这儿，我发现了很多老朋友，尤其是几个瑞典军官。此外，还有战俘汉密尔顿将军（Hamilton）、罗森将军（Rosen）和沃迟梅特男爵（Wachmaiter），他们感叹囚禁生活漫长而痛苦。我们在这里呆了五周等候可以清扫路面的大雪，同时我们忙着准备雪橇和其他一些必备品。由于以前曾经描写过这条线路，尤其是喀山及其周边地区，现在我也就一心赶路直奔西伯利亚。

11月24日，我们寄出大件的行李，伊兹玛伊洛夫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会在这里再呆上几天，因为驾驶着沉重的雪橇在如此崎岖的道路上行进会感觉很难受。28号深夜，使臣先生终于离开喀山，继续朝东北方向行进。沿途有很多小村庄，我们可以频繁地更换马匹。

11月29日，我们穿过一片树林，林子里主要有橡树、冷杉和一些白桦。俄国的这片地区非常富饶，盛产畜牧产品、玉米和蜂蜜。这里蜂蜜的制作和英国本土不同：当地居民取菩提树或任何柔软树木的树干五六英尺^③长，将它们挖成镂空的，在其中一面挖一个约一英尺长、四英寸宽的洞，然后在树干内用木棍交叉隔成一些小格子，一旦蜜蜂在里面筑巢后，人们就小心地盖上一块木板，只留一些小孔让蜜蜂自由进出。这些蜂巢得设置在合适的地方，系在树干的一边并用坚固的隔板固定住，以免遭到蜂巢破坏者熊的袭击。喀山地区的蜂蜡和蜂蜜每年出